

# 移民政策的回归及其分析维度的建构

——一项以国际移民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文 军 黄 锐

**摘 要** 移民研究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在有关国际移民的分析中,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移民的社会网络等概念框架已进入移民理论的核心,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移民输入国的宏观政策对于移民取向、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因此,应当把移民政策作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中心,以制度主义为切入口,一方面以一种历史—比较的视角处理移民输入国的移民政策的演变轨迹以及各个国家移民政策的相似或差异;另一方面考察移民准入政策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移民进入目的地国并且实现社会融入等的限制,以及移民与制度环境在互动过程中的各种因果关系,进而建构出移民政策的分析维度。

**关键词** 移民政策 国际移民 分析维度 制度主义

一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一个日益开放的流动性社会正在生长,进而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诸方面呈现出全球化的特质。其实,与其他任何形式的全球化相比,人口迁移的全球化或许会显得更为普遍<sup>①</sup>。自15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移民大致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1500年至1800年,移民以非洲黑人奴隶为主,是殖民扩张的结果;第二次是欧美工业化时期,主要从欧洲迁移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地;第三次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有关,人口流动空前增加;第四次移民受到战后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与前三次相比,第四次的移民真正具有全球的意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频率与规模达到历史新高,并且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同时成为移民的目的地国、原籍国和

过境国。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全球移民报告2011》显示,2010年全球的国际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1.55亿人增至约2.14亿人。如果再考虑到未来数十年世界各地人口的构成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社会性结构因素的话,全球人口流动的规模将继续扩大,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将有望达到4.05亿的国际移民。并且,在1990年到2010年之间,较发达的“北方”地区移民数量增长4600万,而“南方”的移民人口增长1300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估计的数字表明,“北方”国家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来自“南方”的移民。相关数据显示,在1990年至2010年的二十年间,“南方”国家的“北方”国际

<sup>①</sup>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移民数量(南—北移民)几乎翻番,从1990年的4000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7400万人,占北方移民增长的75%,而南—南移民在全球移民中比例从1990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34%<sup>①</sup>。从总体上来看,2010年南—南移民人数大约是7300万。据测算,全世界有近60%的国际移民生活在较发达的“北方”地区,而在1990年这一数字则为53%<sup>②</sup>。

如果考虑到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的话,南—北国际移民的数字可能还要更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1年《国际移徙展望》中公布的数据已经证实,2008年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发达国家国际移民的增加速度。在2007—2008年,经合组织成员国接纳的长期移民数减少6%,而短期劳动力迁移减少4%。并且,从2009年和2011年的数据来看,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数量进一步减少,2000年至2005年期间国际移民的总人数增加1280万人,而2005年至2010年期间增加的人数则为1050万人<sup>③</sup>。可以说,南—北移民人数已超过南—南移民而成为国际移民发展的一个新趋势,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国际移民研究的重点是南—北移民。

与之相关,移民研究正在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甚至在不同学科和理论的交汇与融合中逐渐生成社会科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移民学。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移民的社会网络等概念框架已经进入移民理论的核心,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流范式,但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国家在国际移民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移民输入国宏观的移民政策对于移民取向、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等。本文试图以制度主义作为切入点建构移民政策的分析维度。

## 二

现代意义上的移民研究源于英国地理学家欧内斯特·莱文斯坦对移民及其规律的“一般性研究”<sup>④</sup>。从近30年来学术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来看,涉及地理学、人口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其中,地理学主要关注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及其一般性规律;人口学旨在讨论移入地和移出地的人口分布状况及其人口迁徙的变迁规律;人类学偏向于探讨移民族群的文化冲突、融合以及认同等问题;历史学则侧重于分析人口迁移的过程,进而梳理移民史;经济学倾向于解释人口的迁移动因以及对

移入地和移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法学则着眼于检讨各国法律、法规对于移民的控制及其可能引发的国际移民问题;政治学比较关心“弹性公民”的社会事实以及作为移民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则重点考察移民社会的构成以及移民群体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先后形成了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移民理论、以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阿金·马博贡耶(Akin Mabogunje)为代表的移民系统理论以及以佩吉·莱维特(Peggy Levitt)和妮娜·希勒(Nina G. Schiller)为代表的跨国主义移民理论等不同的移民理论。无疑,这些研究在论题上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有关跨国迁移的成因及其社会后果的分析与解释,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对于拓展移民研究的既有框架也极有助益,还将不断推动着社会科学研究者探索“移民学”。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过于关注影响移民的社会网络及其社会后果的中观和微观社会机制与因素,而忽视了国家及其宏观的移民政策的影响。迈克尔·泰特尔鲍姆在检讨以往的移民理论时也发现,移民理论家在研究复杂的移民问题时通常容易忽视政治因素的影响<sup>⑤</sup>。不管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学派还是新经济移民理论学派,他们一致强调移民是国家或地区间工资的差别引起的,只要两个国家或地区间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势差,一定会引发移民浪潮。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个人最大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后者则更倾向于将家庭而不是个人视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主体。至于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上的差别,则主要是由市场

①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about Migration* (2011), <http://www.iom.int>.

② 在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报告中,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的所有国家,外加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美国,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被列为发展中国家。

③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1), <http://www.oecd.org>.

④ Ernest G. Ravenstein, “The law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885(48).

⑤ Michael S. Teitelbaum,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002(8).

决定的,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的“双重劳动力市场”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而国家的干预则只能扭曲“移民市场”,甚至带来消极的后果。其实,完全离开国家(包括移民输入国、输出国和过境国)的控制,纯粹由市场决定的移民是不存在的。移民系统理论以及跨国主义移民理论与之不同,虽然考虑到宏观移民制度对于跨国移民的影响,但更多强调的是“跨国家庭”、“跨国社会空间”、“跨国社会结构”以及“跨国社会网络”等对民族国家支配性权力的挑战和消解。当然,笔者并不是完全否定以往国际移民理论的贡献,而是更为强调移民政策在国际移民中的重要地位。进而言之,世界体系理论在宏观层面上深刻地揭示出国际移民的全球性社会、经济根源;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探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吸收外来移民的社会结构性动因;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在微观层面对个人与家庭的移民动机给予多方面的分析;跨国主义的移民理论则证明,移民实践一旦成功,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一旦建成,便会产生累积效应,使人口的国际流动获得自主性的动力<sup>①</sup>。

其实,早在1988年,金斯利·戴维斯已经指出:“移民是政策的产物。”<sup>②</sup>换言之,移民制度或政策几乎对国际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旦实施严格的国际移民准入政策,移民将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进入目的地国,而不得不采用其他非正常途径进入,直接导致大量非法移民的产生。有研究表明,2000—201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有4500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不少人因无法在国内就业而流向国外,其中又以非法移民的增长速度最快。在20年前,进入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只占移民总数的20%,近年来这一比率则高达33%~50%<sup>③</sup>。

与学术研究的情况相反,移民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非常重视移民政策对于人口国际迁移的影响,他们甚至以为对待移民可以像摆弄水龙头开关一样方便<sup>④</sup>。格雷姆·雨果的早期研究表明,在1970年以前,大部分国家并不关心国际移民问题,全球大约只有6%的政府对移民实行限制政策<sup>⑤</sup>。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到国际移民的公民权、社会融入等问题,试图通过严格

的准入政策限制国际移民流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部分国家逐渐认识到国际移民对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引导。不过,移民接受国的政策是具有选择性的,大多数国家倾向于接纳科学技术部门所需要的人才和劳工短缺部门的劳动力<sup>⑥</sup>。因此,忽视国家的作用和移民制度或政策的影响是无法解释国际移民的历史和实际发展状况的。基于此,著名的移民研究学者詹姆斯·霍菲尔德呼吁,与全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的研究相比,国家在人口跨界迁移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更值得关注<sup>⑦</sup>。在此意义上,宏观的移民制度或政策应当成为当前国际移民研究的中心议题。

如前所述,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应当把移民政策置于分析的中心。不过,值得追问的是,移民政策的分析如何展开?从社会政策研究的历程来看,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些社会问题展开调查,进而积极倡导政策的改变。在此过程中,虽然形成了社会政策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但大都是碎片化的,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社会政策的理论脉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陷入困境,社会政策研究开始转向价值分析和制度分析,前者主要涉及新自由主义对

- ① 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
- ② Davis Kingsle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8(14).
- ③ Martin Ruths, “The Potential of Temporary Migration Programmes in Fu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2006(145).
- ④ Michael S. Teitelbaum,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002(8).
- ⑤ Graeme J. Hugo, “Asia and the Pacific on the Move: Workers and Refugees, a Challenge to Nation State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1997(38).
- ⑥ Siew-Ean Khoo, Peter McDonald, Carmen Voigt-Graf and Graeme J. Hugo, “A Global Labor Market: Factors Motivating the Sponsorship and Temporary Migration of Skilled Workers to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7(41); Graeme J. Hugo, “In and Out of Australia: Rethinking Indian and Chinese Skilled Migration to Australi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08(3).
- ⑦ James F. Hollifiel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ow Can We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in Caroline B. Brettell &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Oxford: Routledge, 2000, pp. 137—176.

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政治思想史层面的讨论,而后者则重在考察社会政策的运作逻辑和社会后果,是一种制度主义的分析。本文限于主题与篇幅,主要以制度主义为视角,检讨社会政策的分析维度。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制度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道格拉斯·诺斯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西达·司考切波(Theodore Skocpol)出版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撰文宣告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诞生。此后,新制度主义蓬勃发展,并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1996年,彼得·豪和罗斯玛丽·泰勒撰文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sup>①</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概念中汲取理论养分,在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也强调制度的作用。一方面,既定制度通过提供某种信息和空间激励或约束理性人的选择范围和可能条件;另一方面,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既定制度约束或激励下采取策略性行动和博弈行为。而个体之所以受到制度的约束或激励,主要是因为既定制度所提供的利益较其他制度更大,一旦利益弱化,这一制度也将呈现变迁之势。社会学制度主义发端于组织研究,以及对马克斯·韦伯科层制的反思与批判。在韦伯看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以及组织规模的扩大,为了保障组织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一种依职能和职位分工、分层的组织结构与以正式规则为管理方式的高度理性化体制将产生,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管理体制。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除了注意到制度产生和扩展中理性化的扩张过程之外,还十分重视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组织场域对制度形成之影响,尤其是认识到文化符号、仪式象征等的深深刻意涵。简言之,社会学制度主义旨在以组织发展的“社会适应逻辑”(logic of social appropriateness)对抗传统组织理论的“效率逻辑”或“工具逻辑”(logic of instrumentality)<sup>②</sup>。而历史制度主义则在广泛的意义上考察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未预期结果(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unintended outcomes)。正如保罗·皮尔

62 天津社会科学 2013年第2期

森和司考切波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历史制度主义具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集中关注那些可以引起重大结果或令人迷惑的事件;第二,重点突出事件的背景与变量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序列和位置;第三,以追寻历史的方式寻求对事件和行为的解释<sup>③</sup>。

其实,在笔者看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区别主要源自于三个流派对个体行动和制度的假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个体行动的理性能力以及对利益的自我认知,并且能够采取相应的策略获得最大化的利益;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识到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或者是有可能处于“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状态,并不知道个体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最后的抉择也不一定是最佳的;而历史制度主义认为特定的意义框架、制度环境、行为规范可以透过社会化过程对个体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个体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也能够从相关的历史情境中获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旨在说明制度的外约束属性,社会学制度主义则重在揭示出先验的、特定的文化模式对于制度的影响;而历史制度主义试图将制度置于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之中,以制度与行为之间的互动考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sup>④</sup>。在此意义上,移民政策的分析维度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首先,从问题关怀来看,本文旨在重新理解移民准入政策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于国际移民取向、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以及移民政策的运作逻辑和社会后果,以期将移民政策作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中心。一方面,既需要考察移民准入政策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移民进入目的地国并且实现社会融入等的限制,也必须注意到移民作为积极的

<sup>①</sup> Peter A. Hall &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1996 (XLIV).

<sup>②</sup> James March &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p. 3.

<sup>③</sup> Paul Pierson &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Ira Katznelson &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pp. 693-721.

<sup>④</sup>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行动主体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制度环境。英国学者斯蒂芬·卡斯尔在批评欧美的移民政策时指出,移民政策的失败不是因为移民政策难以推行,而是在于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千百万移民及其家庭改善自身处境的自主力量,并不了解国际移民自身内在的机制和动力<sup>①</sup>。以美国为例,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大批越南人逃往海外,老挝和柬埔寨也有大量居民出逃,在美国形成规模庞大的东南亚难民潮。此后,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严格移民入境及申请归化的资格审查,并对移民入境后的就业进行严格的管理,从而达到限制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目的。进入2000年以来,非法移民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味的限制与排斥并没有获得良好的效果。从2006年3月开始,围绕美国1200万非法移民去留问题,移民和非法移民举着“我们也是美国人”的标语在美国主要城市如华盛顿、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地游行。移民的抗议示威活动,促使参议院加快立法步伐。另一方面,既应当讨论制度与行为互动过程中的各种因果关系,也不能忽视制度的惯性。具体来说,以一种放大的历史视角将移民政策置于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而关注政策与移民行为之间的互动。之所以采取长时段的分析,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移民政策是具有惯性的,某些重要条件和背景的变化往往是非常缓慢的,是一种微量增加的过程,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某种重要结果。并且,即使能够在短时段内找到影响因素,但是这些或许只是一些变量之间的偶然聚合,变量与结果之间并不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因果关系。以法国为例,1992年人民运动联盟党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新任内政部长在1993年6月公开提出法国已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力争实现“零移民”的目标。1997年,社会党在法国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在1998年春推出“舍维内芒法”,允许符合法籍人士的正式配偶、在法国出生的孩子的父母、能够证明已在法国居留十年以上等条件的无证件者可以申请“身份合法化”。2006年5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由萨科齐提交的一项旨在加强移民控制的法案,提出变“被动接受移民”为“主动选择移民”的主张,对高学历、高技术移民进行有选择的接纳<sup>②</sup>。或许从某一较短的时间周期来看,法国的移民政策是具有适应性的,但是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长时段观察,可以说它又

是一种限制性的移民政策。

其次,从可获得的文献资料来看,大多是主要移民输入国的移民政策文本。可以说,时间序列上的演变轨迹以及各个国家移民政策的异同,对于考察移民政策与移民及其社会融入的诸种复杂关系特别重要。布兰德·阿利将制度变迁过程分为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normal periods)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性节点”(critical junctures)<sup>③</sup>。一般来说,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是一种路径依赖式的,制度与外在环境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平衡。在制度断裂的“关键性节点”上,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冲突力量得以释放,制度变迁成为可能,而制度变迁的方向则取决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一旦某一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制度的优势会以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巩固和强化,直至制度断裂的“关键性节点”的到来。因此,在分析移民政策的历史时,更应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分析,寻找历时性因果关系。

至于各个国家移民政策的异同,可以以一种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来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其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也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sup>④</sup>。比如,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两国均属于较发达的“北方”地区,在国际移民组织历年来发布的全球移民报告中位列发达国家之中;第二,两国同处于国际五大移民体系中的北美体系,移民输入数量远远多于输出数量;第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两国的移民政策先后经历从自由放任、限制排斥到适应融合的发展过程,虽采取的具体政策不同,但均取得明显的效果;第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

① Stephen Castle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93.

② 刘力达:《2005年法国骚乱后的法国移民政策研究》,《法国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Blind Alley, “New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A Note of Caution”, *Politics*, 2001(21).

④ Theda Skocpol & Margaret Somers, “The Use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80(22); Ronald H. Chil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Reconsider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 3-113.

法移民、难民、反移民等问题凸显,两国在努力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为未来全球移民治理指出了发展方向。但是,从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来看,比较分析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也希望藉此唤起国内学人对比较分析方法的关注。

从欧美国家的实践来看,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从“熔炉论”到“文化多元论”的发展过程。1782年,法国裔美国学者埃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形象地提出“熔炉论”,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撰文批评“熔炉论”,认为族群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祖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进而提出“文化多元论”的观点。其实,在笔者看来,不管是“熔炉论”还是“文化多元论”,都应当意识到移民的社会融入不再是输入国对外来移民居高临下的单

(上接第18页)的转移上,显然也是不彻底的,这种转移只能是一种相对转移,即它必然会被控制在资本统治的限度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三部门的就业是不可能全部吸收那些被机器排挤掉的劳动力的。此外,从当下中国现实来看,他的这些主张只是根据少数发达国家的现状而做出的一种预测,对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而言,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会带来一种洲际化、共享式的合作经济吗?里夫金显然忽视了资本的建构作用。这种能源革命必然是在资本的主导下发生的,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网络化的形式,必然会进一步加剧资本对能源的控制,这又为一种新形式的资本霸权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手段和舞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里夫金认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单一的国家体制必然会

向要求,也不是移民作为外来者和边缘人必须遵从输入国的社会政策,而是移民与移入国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由此构成未来有关这一议题研究的重要方向。而加强这一议题的研究,更需要强化以政策为导向的移民研究,通过移民政策的细化,把移民的社会适应和再结构化带入新的实践。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研究”(项目号:11JZD028)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号:12&ZD01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黄锐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献忠

被洲际化联盟所取代,这一判断显然过于简单了。面对同样的情形,哈特和奈格里走向了“帝国”,而戴维·哈维则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他们无疑要比里夫金深刻得多。所谓洲际化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背后的根基依然是那种岿然不动的资本霸权。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再研究”(项目号:12CZX002)暨南京大学文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反思”(项目号:11ZXZ00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孙乐强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赵景来